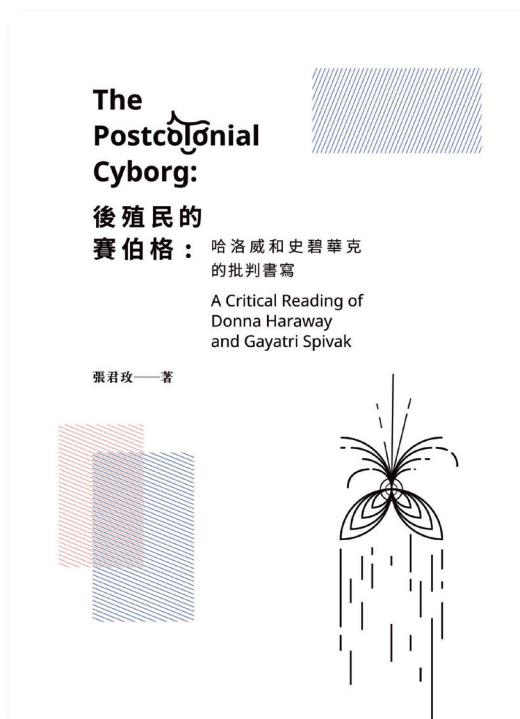


書寫後殖民的賽伯格： 生存、界線與責任

張君玫*

在我個人的學術生涯中，《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¹ 這本專書的寫作與出版是一個轉折點，讓我從現代性研究中的後殖民與科技問題意識，進一步轉到對於當代生態意識的反思與參與。

對於生命的好奇和喜愛是我重要的養分，無論是在日常生活或學術活動中。唐娜·哈洛威 (Donna Haraway) 或蓋雅麗·史碧華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以及其他持續對我具有重要啟示作用的思想家，都有一個共同點，那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¹ 張君玫 (2016)。《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臺北：群學出版社。

就是關於生命如何動態的演化，而這樣的演化橫跨了文化和自然的界線。更精確來說，文化和自然的二元對立——其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我們身為研究者的學科背景與專業化脈絡——都早已不斷在被拆解中。身為一個社會學家，我很清楚觀察到專業和跨界的辯證過程。在十九世紀歐洲古典社會學草創之初，學者強調學科的獨立性，尤其關於要如何和其他相關的學科（尤其是哲學、歷史、生物學和心理學等）區分開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當代，我們開始意識到跨領域的研究或跨學科的視野可以帶來更多力量，不僅回應著我們所處社會與世界的改變，也是任何一個特定學科得以維持內部創造力的重要來源。

哈洛威和史碧華克展現與實踐了兩個不同的生存立足點和知識建構過程；而我身為一個讀者和寫作者，從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生存立足點去感知、建構與轉化我生活世界中的知識與實踐視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所有看似個人的屬性與處境其實都具有高度的社會性和政治性，而這也是這兩位思想家，以及我個人，都共同強調的。換言之，這兩位女性主義學者雖然都不是社會學科的專業，但都分享了社會學扣連個體和社會的問題意識。

哈洛威自己並不諱言，她的處境和所在地是相對優勢的：她是美國人、白人、天主教徒、知識階層，以及異性戀者。她強調這些位置的政治意義，遵循女性主義所在地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的思考與實踐。因此，哈洛威在談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她的位置是由中心往外延伸與連結的。她對於結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的強調也是她個人學術的實踐。她把黑人女性主義科幻作品視為賽伯格的展演，固然是一個結盟的姿態，以及意義的詮釋，但也可能被批判是出自一種從白人位置出發的挪用。就像她把被基因改造以便進行癌症研究的腫瘤鼠和其他實驗室動物稱之為賽伯格和同伴物種，固然賦予人類社會中的非人類動物所擁有的能動力，卻也引起動物權人士的不滿，批評是一種人類中心自以是的說法。這些衝突的根源都牽涉到身分維持和跨越的政治動態。對於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批判，除了是同一與排除的疑慮之外，也會因為批判者所處的位置，而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當哈洛威以「賽伯格」（cyborg, cybernetic organism）作為一個批判的意象時，她開啟了大家對於界線跨越的熱情，但也見證了界線跨越和侵犯之間的一線之隔。

史碧華克是來自印度的思想家，她一直在印度完成大學學業之後，才到美國讀書，並留在美國工作。她的後殖民論述確實是從她的所在地出發，一個由前殖民地移居到全球大都會中心工作與生活的後殖民知識分子。左派人士以往批判史碧華克和其他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學術是一種個體主義的自戀展現，強調自己處於中介位置的進步性，從而忽略了更澈底和結構性的改變。傳統社會主

義和馬克主義者對後殖民論述的敵意是毫不遮掩的。史碧華克後來在《後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中反省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亦即，後殖民知識分子是否有可能占用了土著報導人的發言空間？甚或阻礙了土著報導人發揮更進一步影響力的可能性？後殖民的知識分子，在相當程度取得了前殖民者的知識域能力之後，也因此具備了更多的發言權，是否應該及如何可以為更多在殖民政治架構中仍處於劣勢的在地人發聲？或更重要的，更積極打造舞臺，在世界中打開更多可能性，讓底層或邊緣可以自己發聲？史碧華克對於何謂發聲，提出了一個結構性的定義。所謂的發聲，並不是僅僅發出聲音，而是指稱在制度上具有效力的言說行動。底層者、邊緣者、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被損害者，以及被剝奪聲音者，如何可能做出在制度上有效的行動？

上述問題其實並不僅限於後殖民論述中，而可以說是數百年來各種解放、抗爭和平權運動的核心問題。自由、平等、博愛並不是說說就好，而是持續不斷的挑戰。從上個世紀中的殖民時期結束之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界線確實變得模糊，但新殖民的政治布局也不斷在形構中。如果我們從界線重組的角度來看待權力的抗爭，在抗爭過程中持續浮現和成形的不正是各種打破既定界線之後重新組合的賽伯格嗎？無論是階級、地位、種族、性別、性取向、物種，乃至於其他向度的界線重構。在當代全球文化政治中，各種科技人造物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構多樣化既真實又虛擬的溝通場域，加上種種生態危機中生命脆弱性的連結與纏繞，我們都早已經是賽伯格，包括我們人類，以及我們不僅是人類的存在。

確實，強調界線的打破、重組、連結、纏繞，幾乎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主題曲之一。然而，這是否也是這個時代的危機？界線的打破與重組並不是風花雪月，更不是可以輕描淡寫的事情。如果僅僅停留在界線流動的歡愉與刺激，那不僅可能淪為膚淺，也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會在政治與倫理上帶來災難的過果。哈洛威在 1985 年首次出版的〈賽伯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其實早就強調，我們在享受跨越界線的歡愉時，也應該負起重建界線的責任。到這個世紀初，關於生態危機的省思更加密集與強化，哈洛威在更加強調共生與纏繞的同時，也更加強調責任 (*responsibility*)，以及回應能力 (*response-ability*)。然而，在很多談論界線重組及賽伯格意象的當代論述中，往往忽略了責任和回應能力的關鍵意義和行動性。哈洛威在她的所在地中有意識地去進行更多連結，講述更多故事，並從中提供我們做理論和實踐的可能性。

同樣地，史碧華克也從她的所在地出發，去思考並實踐在這個充滿危機的世界當中行動的可能性。她回到家鄉去進行多年由下而上的教育意識改造是一

個例子，在美國長春藤大學裡對全球中心的菁英學生進行她稱之為「欲望重組」(reorganization of desires)的啟發工作是另一個例子。在這些實踐當中，她提出「跨國族讀寫能力」(transnational literacy)、教育行動主義(educational activism)、美學的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等概念，來闡述她認為重要的任務。這些任務包括去反省並改造我們在經歷歐洲往外擴張與殖民的近現代歷史，以及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起之後，所追求的種種價值。在這些被我們認為普世的現代性價值中，固然有民主自由的種子，卻也包含了新自由主義馴化的價值傾向，從而不利於更澈底的社會改造與正義。史碧華克指出，我們必須去解構我們「不能不想要的」，亦即現代性、進步、發展等看似理所當然但充滿陷阱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惡化，以及對此危機的意識覺醒，重新省視、批判與改造全球資本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主流價值觀點，更是刻不容緩。

身在臺灣這個多重殖民的島嶼，我在思考後殖民現代性時把書寫視為另一種演化的技術，並在這樣的思考過程中，開始觸及各種跨領域的研究取向，包括哈洛威和史碧華克這兩個不同發言位置的學者。身為一個「地方」的學者，面對全球化和現代性的欲望，以及大學體制的資本主義化和商品化，要如何保有思想和學術的自主性，可能是最大的挑戰。地方和全球之間的拉扯與辯證，並不僅是理論的題目而已，而是關係到個人和文化層次的存續問題。我在博士論文談漢字的語言現代性，以及2012年出版的第一本專書《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中，即開始處理這些議題。在2016年出版《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延續這些核心的關懷，透過闡述與扣連哈洛威和史碧華克這兩位學者的基本概念，來建構我對「後殖民的賽伯格」這個批判意象的想像與實踐。我在《後殖民的賽伯格》中所鋪陳的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因此也是我對於這兩位學者的批判閱讀(critical reading)。然而，這本書並不是單純的二手介紹書，而是另一個思想圖像的形構過程。從我身為在臺灣這座島嶼生活的學術讀者／翻譯者／思考者／書寫者和實踐者的生存立足點出發，關於「後殖民的賽伯格」作為一個批判意象的可能性，接續「後殖民的陰性情境」作為一個處境知識的物質基質，做更進一步的闡述。

哈洛威的賽伯格作為批判的意象，以及史碧華克的後殖民主體性作為批判的構成，都涉及到界線的破裂和重組，我從「界線的抵抗辯證」去理解並拆解這些動態過程。在種種關於壓迫的抵抗中，必然牽涉到至少兩個層次，一方面是關於如何抵抗強權對於被壓迫者的界線侵犯；另一方面是關於如何在種種壓迫的向度之中與之間不落入保守的界線固著，而在抵抗中也持續實踐著創造性的雜揉。

《後殖民的賽伯格》共有五章。第一章導論，說明何以這兩位學者對我有特別的意義。第二章檢視她們作品中所彰顯的批判意象，包括賽伯格和從屬者等。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檢視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方法論，以及她們的倫理圖像。批判和倫理之間的緊密關係貫穿了我的論述。第五章回歸到各自獨特的發言位置和生存處境，來思考界線的批判、抵抗和重構，最後座落在我們的島嶼主體性的動態構成上，從而也標示一個持續進行的方向。在《後殖民的賽伯格》一書的結語中，我寫道：

我們，身為後殖民的賽伯格，能夠做的首先是把自己放回去這些活生生的脈絡中。成為在地生活的思考行動者，然後展開所有必要的連結勞動。

展開勞動是我從史碧華克對解構的說明中得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史碧華克主張我們應該要展開解構的工作或勞動（setting to work of deconstruction）。從字面上來說，可能翻譯成工作會是比勞動更適當的，但我刻意將之翻譯為勞動，是為了彰顯其中投入與努力的成分。工作一詞在漢字等語境中和職業意義的工作（job）太過接近。勞動一詞比較能夠掌握此處所要強調的身心一致投入於社會改造的解構事業。

誠如哈洛威所言，「賽伯格是我們的存有論」。然而，「我們」是誰或什麼並不是既定的，而早已需要不斷在界線混雜與衝突的地帶中構成與再度構成。基本上，我在這本專書的寫作中，不僅是在闡述或勾勒「後殖民的賽伯格」作為一個批判的意象，其實也是我個人身為後殖民地方知識工作者的實踐，在書寫和其他活動中不斷去構成與再度構成一種後殖民賽伯格的存有論。這樣的存有論乃是關係的、動態的、批判的、投入的與改造的。我強調「地方」，並不是為了宣揚某種偏狹的地方主義或排外心態，而是基於生存立足點的物質性和歷史性。唯有從自身的生存立足點出發，思想和理論才是有生命的，才有可能成為行動的養分。

因此，《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一書，就像《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都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的書，而是動態結合理論和生活的書寫。這是我希望可以持續呈現給讀者的思想圖像。